

# 敦煌技术院考略

屈直敏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繁荣, 大批科技人才的涌现, 主要得益于技术教育的发展。然而作为唐代地方技术教育的重要机构——技术院, 则不见于文献记载。在此主要通过敦煌出土文献的梳理, 就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技术院的设立进行考述。研究表明, 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皆设有技术院, 既是职能部门, 也是培养技术类人才的教学机构, 以天文历法、阴阳卜筮等技术类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 实行“宦学事师”的官师合一教育体制。

**关键词:** 技术院 州学 阴阳学 金山国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2-0067-14

唐代技术院的建置, 史无明载, 据《资治通鉴考异》引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载:“(太和)八年春暮, 上对宰相叹天下无名医, 便及郑注, 精于服食, 或欲置于翰林技术院, 或欲令为左神策判官。注自称衣冠, 皆不愿此职。”<sup>①</sup>是知唐文宗时设有翰林技术院, 而且翰林技术院的职位似乎极其卑微, 由是之故, 郑注不愿出任该职。然而唐代地方技术院的设立, 也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 但敦煌文献中却保存了大量关于技术院的题记, 为研究唐代地方技术院的建置提供了宝贵资料。敦煌研究院李正宇较早对敦煌技术院进行研究, 所撰《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一文认为“技术院是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新成立的机构, 是掌管归义军的典礼祭祀、占卜阴阳、天文历法之事的职能部门。但它不仅仅是职能部门, 同时, 也是为归义军培养礼仪、阴阳、历法、占卜等方面专门人才的教学部门”<sup>②</sup>。高明士<sup>③</sup>、林聪明<sup>④</sup>、杨秀清<sup>⑤</sup>、陈于柱<sup>⑥</sup>、樊锦诗<sup>⑦</sup>等诸多学

**收稿日期:** 2019-12-20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2020jbkyjd002)

**作者简介:** 屈直敏(1972-), 男, 贵州松桃人。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

① [宋]司马光编著, [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5, 北京:中华书局, 1956年, 第7897页。

②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第43页。

③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 1986年, 第252页。

④ 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1年, 第331页。

⑤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94-95页。

⑥ 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36页。

⑦ 樊锦诗《敦煌与隋唐城市文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112-113页。

者皆从其说。姜伯勤认为“公元十世纪初，沙州出现了‘技术院’的建置，其职能相当于中央太常寺礼院，太史监和太卜署通玄院所管事”，“其中有方技之术的传授”，同时“也是以艺学（天文历算阴阳卜筮等）召至沙州州治居之的处所”<sup>①</sup>。冯培红据杨秀清考定 P. 4044《修文坊巷[社]再缉（葺）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的写作时间大致在光化三年（900）至天复四年（904）之间（即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的基础上），推测“张氏归义军时期已经设置了技术院”<sup>②</sup>。显然上述学者关于敦煌技术院设立时间的考定，尚存歧议，故拟作考补，以就教于方家。

## 一、金山国创立技术院说质疑

关于敦煌技术院的设立时间，以李正宇的观点影响最大，其主要证据之一是 P. 3192《论语集解卷第六》背面题记之“技术院礼生翟奉达”。考 P. 3192《论语集解卷第六》卷末题有“丙子年（856）三月五日写书了，张□□读”，卷背《社司转帖》题有“大中十二年（858）四月一日社官李明振”，并无“技术院礼生翟奉达”题记<sup>③</sup>。显然，李正宇据以考定技术院成立时间的题记并不存在，但此后诸多学者，却对这条并不存在的题记频加引用。笔者在查考敦煌文献时发现，P. 3197V《杂写》题有“《新撰时务纂集珠玉要略抄》一卷，圣教技术院学士、敦煌礼生翟奉达”，疑李正宇系将 P. 3197V《杂写》的题记误作 P. 3192《论语集解卷第六》背面的题记，且简写作“技术院礼生翟奉达”。此外，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也是李正宇等学者考定敦煌技术院设立时间的关键因素。姜伯勤、冯培红等学者所据主要证据之一是 P. 4044《修文坊巷[社]再缉（葺）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的写作时间，然学界对这件敦煌文书的写成年代存有争议，而姜伯勤、冯培红两位学者却未详考。显然，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和两件敦煌文书的年代，是前辈学者考定敦煌技术院设立时间的关键，因而极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考辨。

关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学界有多种说法，其中主要有：905年说（王重民等）、906年说（李正宇、杨秀清等）、908年说（王冀青等）、909年说（杨宝玉、吴丽娱等）、910年说（卢向前、荣新江等）等5种观点。冯培红在综合考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申了后梁开平三年（909）说<sup>④</sup>。因此，以906年为张承奉建立金山国

① 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100-106页。

②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81-84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3-114页。关于“丙子年”为“公元856年”之考证，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14页。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6页。

④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93-200页。

的年代，并以此考定伎术院的设立年代，并不确切。

关于翟奉达其人其事，向达<sup>①</sup>、藤枝晃<sup>②</sup>、苏莹辉<sup>③</sup>等皆略有考述，然尚有缺漏。笔者检索敦煌文书和石窟供养人题记，检得有关翟奉达的题记共 16 则，为了便于考述，现抄录考辨如下：

1. BD. 14636（北新 836）《逆刺占》卷末题：

于时天复二载（902）岁在任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记。

右旁注：

再温字奉达也。

其后抄诗三首，诗后漫笔题云：

幼年作之，多不当路，今笑！今笑！/已前达走笔题撰之耳/年廿作，今年遇见此诗，羞煞人！羞煞人！<sup>④</sup>。

按：天复二年（902）翟奉达年 20 岁，则翟奉达生于中和三年（883）。

2. P. 2094a《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及《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金刚》卷末题：

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908）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此经赞验功德记，添之流布，后为信士兼往亡灵及见在父母合邑等，福同春草，罪若秋苗，必定当来，俱发佛会。

P. 2094b《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题：

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sup>⑤</sup>。

按：唐昭宗天复仅 4 年，“天复八载”实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又《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卷首题有“奉达书”三字，后涂抹，但仍可辨识，是知该写卷是乃翟奉达所抄。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补抄的分数、真言，系翟奉达依西川印本补。

3. P. 2668《新菩萨经》末题：

乙亥年四月八日，布衣翟奉达因施主请来，故造短句而述七言<sup>⑥</sup>。

按：在题记之后抄有《同光四年马圣者造窟龕功德文》，考同光四年（926）前之“乙亥年”当为乾化五年（915）。

① 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图书季刊》新第 5 卷第 4 期，1944 年 12 月，第 1-8 页，后收入向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421-433 页。

② [日] 藤枝晃《敦煌日历谱》附论《关于翟奉达》，《东方学报》第 45 册，1973 年，第 434-439 页。

③ 苏莹辉《敦煌翟奉达其人其事》，载《瓜沙史事丛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70-87 页。

④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3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111-122 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43、150 页。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56-157 页。

## 4. S. 2404《后唐同光二年（924）甲申岁具注历日并序》卷首题：

押 衙守随军参谋翟奉达撰上<sup>①</sup>。

按：《旧唐书·职官志三》载：“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无员数也，随军四人”。注云：“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sup>②</sup>。

## 5.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中央“新样文殊”下发愿文：

清士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参 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浔阳翟奉达……于时大唐同光三年（925）岁次乙酉三月丁巳朔廿五日辛巳题记之耳。

又该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三身供养人题记：

施主节度押衙行随军参谋、兼御史中丞翟奉达供养。

后敕授归义军节 度随军参谋、行州□□□、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怀……上柱国之官也<sup>③</sup>。

按：第一则“施主翟奉达”的供养人题记是修窟时所题，第二则题记位于榜题牌子和供养人画像头部之间的空白处，是翟奉达晋升官职后补题<sup>④</sup>。苏莹辉认为“州”字后可能为“学博士”三字<sup>⑤</sup>。

## 6. 莫高窟第98窟西壁南向第18身供养人题记：

节度押衙行 随军参谋、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翟奉达一心供养<sup>⑥</sup>。

按：据贺世哲、荣新江等研究，莫高窟第98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始建于后梁贞明时期（915-920），最后完工当在同光三年（925）前后<sup>⑦</sup>。马德认为第98窟始建于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22页。有关“押衙”、“参谋”的研究，参见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177-236页。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载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3）》，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76-87页。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2-72页。冯培红《唐五代参谋考略》，《复旦学报》2013年第6期，第89-98转166页。

③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1、103页。

④ 关友惠、施萍婷、段文杰《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文物》1978年第12期，第41-46页；[日]藤枝晃《关于220窟改修的若干问题》，《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第12-13页；又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67-84页。

⑤ 苏莹辉《瓜沙史事丛考》，第86页。

⑥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45页。

⑦ 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0-237页。荣新江《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49-51页。

914年，最终完成年代在920年前后<sup>①</sup>。郑雨认为第98窟的始建与完成，在贞明六年（920）至龙德二年（922）秋冬之前<sup>②</sup>。王惠民认第98窟建成于同光二年（924）<sup>③</sup>。

7. P. 3247V《大唐同光四年（926）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卷首题：

随军参谋翟奉达<sup>④</sup>。

8. BD. 14636（北新836）《后唐天成三年（928）戊子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卷首题：

随军参谋翟奉达撰上。

按：此残历粘于前引《逆刺占》卷首。

9. 散1700《寿昌县地境》末题：

晋天福十年（945）乙巳岁六月九日，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sup>⑤</sup>。

按：后晋高祖天福只有8年，“天福十年”乃少帝开运二年（945）。向达认为“州学博士翟”即“翟奉达”<sup>⑥</sup>。据《旧唐书·职官志一》载：武德七年定令，中郡博士，正九品下。中下州博士，从九品上，下州博士，从九品下。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改定品秩，京兆、河南、太原、大都督府博士，从八品上阶。中都督府、上州博士，从八品下阶。中郡博士，正九品上阶。下州博士，正九品下阶<sup>⑦</sup>。又据敦煌博物馆藏编号76的《天宝十道录》载，敦煌沙州为下州，敦煌为上县，寿昌为下县<sup>⑧</sup>。而《元和郡县图志》则载，沙州为中府，敦煌为上县，寿昌为中下县<sup>⑨</sup>。刘安志认为沙洲升都督府的时间为代宗永泰二年（766）升为都督府<sup>⑩</sup>。据此，翟奉达之州学博士官品应为从八品下阶。

10. S. 560《天福十年具注历日》首题：

① 马德《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19-21页。

② 郑雨《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九州学刊》1992年第4卷第4期，第35-39页。

③ 王惠民《曹议金执正前期若干史事考辨》，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427-430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299页。

⑤ 该文书系向达以《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为题，首次发表于《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12月，第1-8页，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21-433页。

⑥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29-431页。

⑦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83-1802页。

⑧ 该写卷或定名为《郡县公廨本钱簿》，撰成时间在开元至天宝年间。参见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文史》第13、14辑，1982年，第89-145、67-104页。[日]布目潮汎、大野仁合撰《唐开元末府州县图作成の试み——敦煌所出天宝初年书写地志残卷を中心に》，载布目潮汎主编《唐·宋時代の行政・经济地图の作制研究成果报告书》，大阪：大阪大学教养部，1982年，第39-64页并附图。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煌第58号卷子研究之一》、《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5-428、429-476页。荣新江《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九州》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6-129页。

⑨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沙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5-1026页。

⑩ 刘安志《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59-66页。

寿昌县令<sup>①</sup>。

按：该写卷仅存首行标题，向达认为系翟奉达所纂<sup>②</sup>。

11. S. 95《显德三年（956）丙辰岁具注历日并序》卷首题：

登仕郎守州学博士翟奉达纂上<sup>③</sup>。

按：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令，登仕郎为文散官。为正九品。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改定品秩，为正九品下阶<sup>④</sup>。

12. 津艺 193（馆藏号：4632）《佛说无常经》卷末题：

显德五年（958）岁次戊午三月一日夜，家母阿婆马氏身故，至七日是开七斋，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忆念，敬写《无常经》一卷，敬画宝髻如来佛一铺，每七至三年周，每斋写经一卷追福，愿阿娘托影神游，往生好处，勿落三途之灾，永充供养<sup>⑤</sup>。

按：该写卷与北敦 8259（冈 44）、P. 2055 为同一写卷。《佛说无常经》是翟奉达为亡妻马氏追福，第一七斋抄写的佛经<sup>⑥</sup>。

13. P. 2055《佛说善恶因果经》末题：

弟子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为亡过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标题如是：第一七斋写《无常经》一卷、第二七斋写《水月观音经》一卷、第三七斋写《咒魅经》一卷、第四七斋写《天请问经》一卷、第五七斋写《阎罗经》一卷、第六七斋写《护诸童子经》一卷、第七斋写《多心经》一卷、百日斋写《盂兰盆经》一卷、一年斋写《佛母经》一卷、三年斋写《善恶因果经》一卷，右件写经功德，为过往马氏追福，奉请龙天八部、救苦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以作证盟，一一领受福田，往生乐处，遇善知识，一心供养<sup>⑦</sup>。

按：翟奉达为亡妻马氏追福功德，每斋写经 1 卷，共 10 卷，现分别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津艺 193，馆藏号：4632）、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北敦 8259 冈 44）、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P. 2055）。马氏亡于显德五年（958）三月，故“三年斋”当为建隆二年（961）三月，是知该写卷抄于建隆二年（961）。

14. P. 2623《显德六年（959）己未岁具注历日并序》卷首题：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 2 卷，第 61 页。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 431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 1 卷，第 45 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42《职官志一》，第 1784、1802 页。

⑤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86 页。

⑥ 参见施萍婷《一件完整的社会风俗史资料——敦煌随笔之三》，《敦煌研究》1987 第 2 期，第 34-37 页。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23-328 页。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348 页。

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行沙州经学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翟奉达撰<sup>①</sup>。

按：据《旧唐书·职官志一》载：武德七年（624）定令，朝议郎为文散官，正六品。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改定品秩，为正六品上阶<sup>②</sup>。

15. P. 3197V《杂写》云：

《新撰时务纂集珠玉要略抄》一卷，圣教伎术院学士、敦煌礼生翟奉达<sup>③</sup>。

按：该题记之前有“天福五年（940）庚子岁十二月廿日”题记，之后有“丙寅年六月十七日大王夫人巡边”、“维大宋乾德四年岁次丙寅（966）六月十七日大王夫人出南门巡边”题记，据此推知，该题记年代可能在后晋天福五年（940）至宋乾德四年（966）之间。据《旧唐书·职官志二》载：“学士无员数，自武德已来，皆妙简贤良为学士。故事，五品已上，称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sup>④</sup>。

从上述题记可知，翟奉达本名再温，字奉达，生于中和三年（883），天复二年（902）为敦煌郡州学子弟，时年20岁。开平二年（908）至乾化五年（915）为布衣，同光二年（924）至天成三年（928）任随军参谋，开运二年（945）任州学博士，显德三年（956）任登仕郎，兼守州学博士，显德六年（959）至建隆二年（961）任朝议郎，兼行沙州经学博士。由于前辈学者多将“圣教伎术院学士、敦煌礼生翟奉达”题记简作“伎术院礼生翟奉达”，故认为翟奉达在开平二年（908）之前是以学生身份在敦煌伎术院学习礼仪，因而推断敦煌伎术院创设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然据《旧唐书·职官志二》载：司天台属官有“五官礼生十五人”<sup>⑤</sup>。《新唐书·百官志二》载：“乾元元年（758），曰司天台，艺术人韩颖、刘焯建议改令为监，置通玄院及主簿，置五官监候及五官礼生十五人，掌布诸坛神位”。又《百官志三》载：“太常寺、礼院礼生各十五人”<sup>⑥</sup>。《唐会要·选部上》“吏曹条例”载：“太和八年（834）正月，勅吏部疏理诸色入仕人等，令勘会诸司流外令史，府史、掌闲、礼生、楷书、画工、及诸司流外令史等，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六百五十七员请权停，一千三百七十二员，请令诸司守缺，除见在外，以后不得更置，委御史台察访”<sup>⑦</sup>。据此可知，“礼生”并非学生，而是已经入仕的流外官，故“敦煌礼生翟奉达”应属入仕官吏，而非学生。此外，唐宋时期，“学士”的地位较“博士”高，故敦煌礼生翟奉达任伎术院学士应在乾化五年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84、1796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134-137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48页。

⑤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6页。

⑥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6页；又同书卷48卷《百官志三》，第1242页。

⑦ [宋]王溥《唐会要》卷74《选部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52页。

(915)之后。据此,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设立技术院的推断则难以成立。

## 二、敦煌技术院的建置

前辈学者据以考定技术院设立年代的另一件敦煌文书是 P. 4044 《修文坊巷社再辑(葺)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这件敦煌文书没有确切纪年,序文载有“都勾当技术院学郎李文进”。除此之外,笔者查考敦煌文书、敦煌绢画题记、石窟供养人题记,还检得 6 则有关技术院的记载,为了便于考述,现全部抄录考辨如下:

1. P. 3716v 《新集书仪》末题:

天咸五年(930)庚寅岁五月十五日,敦煌技术院礼生张儒通<sup>①</sup>。

2. P. 3906 《七言诗》中夹抄一行题记:

天福柒年(942)壬寅岁肆月贰拾日,技术院学郎知慈惠乡书手吕□<sup>②</sup>。

按:“吕□”,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录作“吕均”<sup>③</sup>。

3. P. 2718 《茶酒论一卷并序》末题:

开宝叁年壬申岁(970)正月十四日,知技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sup>④</sup>。

按:开宝三年(970)应为庚午,壬申为开宝五年(972),在此以开宝三年(970)为据。

4. 斯坦因所获 Ch. xxxviii. 005 (BM. SP03) 《双身观音图》发愿文末题:

清信士弟子兼技(伎)术子弟董文员一心供养<sup>⑤</sup>。

按:“员”字,或作“受”<sup>⑥</sup>、“亥”<sup>⑦</sup>。《西域美术》考定该绢画的年代为 9 世纪中叶。荣新江据绢画有“清信弟子义温(当作‘温义’)为己身落番得归乡敬造一心供”题记,考定该绢画绘于 9 世纪末叶<sup>⑧</sup>。又 P. 2615 首题“□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8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79 页。

③ 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04 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7 册,第 305 页。

⑤ [英] 韦陀(Roderick Whitfield)《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藏品》(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第 1 卷《敦煌绘画 I》,东京:讲谈社,1982 年,原色图版第 24,单色图版第 75,说明,第 321 页。又载《英藏敦煌文献》第 14 册附录《英国博物馆藏敦煌绢纸画及写本上汉文部份》,第 155 页。

⑥ 李正宇《敦煌遗书宋人诗辑校》,《敦煌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41-42 页。

⑦ 《敦煌千佛洞古画摹本の作制》,《国华》第 31 编第 11 册(总第 372 号),1921 年 5 月,第 398 页。马德《敦煌绢画题记辑录》,《敦煌学辑刊》1996 年第 1 期,第 137 页。马德《敦煌画匠称谓及其意义》一文作“员”,《敦煌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2 页。

⑧ 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年,第 97 页。

一卷□□□子弟董文员写记通览”<sup>①</sup>。董文员之名还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观世音菩萨毗沙门天王像》题记：“清信佛弟子董文员先奉为先亡父母神生净土，勿落三途，次为长兄僧议渊染患，未蒙抽减，凭佛加威，乞祈救拔。敬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及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供养。时庚寅年（930）七月十五日题。董”<sup>②</sup>。日本京都山中商会藏（后流入大阪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镰仓长尾美术馆藏有照相复制品）敦煌本《十王经图卷》末题：“辛未年（971）十二月十日书画毕，年六十八写，弟子董文员供养”<sup>③</sup>。“辛未年”，学界较多认为是乾化元年（911）<sup>④</sup>，太史文考定为开宝四年（972）<sup>⑤</sup>，张总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定董文员所绘三图卷的年代分别为：10世纪初，长兴元年（930），开宝四年（972）<sup>⑥</sup>。据此，董文员当生于天复四年（905年初），而唐代官学入学年龄限制一般为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sup>⑦</sup>，故董文员兼伎术子弟的时间应在曹氏归义军时期。

5. P. 3197V《杂写》云：

《新撰时务纂集珠玉要略抄》一卷，圣教伎术院学士、敦煌礼生翟奉达。

6. 敦煌莫高窟第437窟（伯希和编号为123a）甬道北壁供养人题记：

故节度押衙知伎术院录事张口受一心供养<sup>⑧</sup>。

按：《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录作“故节度押衙知□（衙）术院□事张□□一心供养”。又甬道南壁有“……归义军节……西平王曹元忠供养”题记<sup>⑨</sup>。敦煌窟第427窟窟檐题记载“维大宋乾德八年岁次庚午正月癸卯朔二十六日戊辰，勅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曹元忠之世，创建此檐纪”<sup>⑩</sup>。考宋太祖乾德年号仅6年，“乾德八年”实为开宝三年（970），据此，曹元忠在开宝三年（970）已称“西平王”，此窟的重修也应在此前后<sup>⑪</sup>，故“张□受”知伎术院录事当在开宝三年（970）之前。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270页。

②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图56，第102页。

③ 林中树中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2卷《五代至北宋》，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④ [日] 秃氏祐祥、小川贯式《十王生七经赞图卷的构造》，载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五《中亚佛教美术》，1962年，第257-296页。

⑤ [美] 太史文《〈十王经〉与中古中国佛教地狱观之形成》（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檀香山（Honolulu）：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年，第152-164页。按：太史文据农历与公元纪年交替时的差别，认为辛未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已是公元972年初。

⑥ 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究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115页。

⑦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0页。

⑧ [法] 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页。

⑨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66页。供养人曹元忠的题记，《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273页）录作“归义军节度使检校……中书令河西口使西平王曹元忠供养”。

⑩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60页。

⑪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229页。

7. P. 4044《修文坊巷社再缉(葺)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载:

厥有修文坊巷社敦煌耆寿王忠信、都勾当伎术院学郎李文建、知社众等计册八人,抽减各己之财,造斯功德,专心念善<sup>①</sup>。

按:“建知”二字,原作“进之”,后涂改。“建”字,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作“进”,并定其为金山国时期文书<sup>②</sup>。郝春文<sup>③</sup>、颜廷亮<sup>④</sup>等从其说。杨秀清认为这件文书作成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即906年之前)<sup>⑤</sup>。

从上述题记的纪年和考辨可知,第1、2、3则题记有确切纪年,最早的为天成五年(930),最晚的为开宝三年(970),均属曹氏归义军时期。第4、5、6则,虽无确切纪年,但经过考辨,大致可确定其年代应属曹氏归义军时期。第7则的年代虽有争议,但学者们关于该写卷年代的考定,都是以这件文书中有“奉为我拓西金山王,永作西垂之主”(“拓西金山王”,原作“拓西金山之主”,后涂去“之主”二字,补“王”字)为据。显然,这件文书中的“拓西金山王”是考定其年代的关键。学界普遍认为文书中的“拓西金山王”是指张承奉,但对张承奉称“金山王”的时间却有多种说法。苏莹辉认为“此处的所谓‘拓西金山王’,盖在张承奉萌建号称王之念的初期”<sup>⑥</sup>。郑炳林认为P. 4640《己未年至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所载庚申年(900)六月“十七日,金山传处分楼上纳粗纸壹帖”之“金山”即“当时称金山王的张承奉”<sup>⑦</sup>。杨秀清认为“张承奉开始称金山王的时间大致在光化三年至天复四年(900-904)之间”<sup>⑧</sup>。考之敦煌文献,“金山王”之名还见于P. 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和S. 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据P. 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末题“于时天成四年岁当赤奋若律中夹钟蕤生壹叶题”,是知该写卷的写成年代为天成四年(929),是年张良真“龄当八九”、“从心之岁”,即是年72岁或70岁。又张良真“金山王时,光荣充紫亭镇主”、“偏优镇将,二八余年”,“充应管内外都牢城使,自居崇列,才经五五之秋”,则张良真任紫亭镇主16年多,任都牢城使25年<sup>⑨</sup>。以此推之,张良真大约在889年任紫亭镇将,905年任都牢城使。另据S. 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载:“洎金山王西登九五,公乃倍(陪)位台阶”<sup>⑩</sup>。“九五”指帝位,古称“皇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85页。

③ 郝春文《敦煌社邑文献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66-669页。

④ 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3、190-191页。

⑤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第63-64页。

⑥ 苏莹辉《从几种敦煌资料论张承奉、曹议金之称“帝”称“王”》,《敦煌学》第11辑,1986年,第67-71页;后收入苏氏著《敦煌文史艺术论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146-153页。

⑦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40页。

⑧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第64页。

⑨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第96-97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6卷,第204-205页。

帝”为“九五之尊”，这也佐证了张承奉在建立金山国称帝之前已经自称“金山王”。据此可知，这件敦煌文书当作成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

综上所述，技术院并不是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新设立的机构，从上述有关技术院的6则题记均属曹氏归义军时期可知，曹氏归义军时期无疑设有技术院。有关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设立技术院的记载，仅有1则文书，虽属孤证，似乎在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前的张氏归义军时期在敦煌已经设有技术院。

### 三、敦煌技术院与阴阳学

据文献记载，在唐代较为完善的官学体系中，并未设立阴阳学<sup>①</sup>。考《旧唐书·职官三》载：太常寺下设八署，其中太卜署置“令一人，丞一人，卜正二人，卜博士二人。太卜令掌卜筮之法”<sup>②</sup>。《唐会要·修撰》载：贞观十五年（641）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吕才及诸阴阳学者十余人，撰《阴阳书》，凡五十三卷”。又同书《技术官》载“神功元年（697）十月三日，谓自今已后，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署令”<sup>③</sup>。《唐大诏令集》载，神功元年（697）闰十月《厘革技术官制》规定“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按此处脱：不得过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sup>④</sup>。《新唐书·选举志》载“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sup>⑤</sup>。据此，唐代阴阳卜筮之职，似乎属太常寺太卜署管辖。直到元朝，阴阳学才正式纳入地方官学体系<sup>⑥</sup>。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夏六月，“始置诸路阴阳学，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sup>⑦</sup>。据《延祐四明志》载，元代天下郡邑设阴阳教授司，置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凡阴阳、历数、巫术、铜壶之事咸肆焉”<sup>⑧</sup>。显然，元

① [日] 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の研究——日本学校教育の源流》，东京：不昧堂书店，1953年。冯晓林《中国隋唐五代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宋大川《唐代教育体制研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任育才《唐代的官学》，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

②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76-1877页。

③ [宋] 王溥《唐会要》卷36《修撰》，第651页；又同书卷67《技术官》，第1183页。

④ [宋]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00《政事·官制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05页。

⑤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74页。

⑥ 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0-189页。叶新民《元代阴阳学初探》，《蒙古史研究》第6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57页；又载《元代文化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104页。

⑦ [明] 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4页。

⑧ [元] 袁桷等《延祐四明志》卷14《学校考》，载《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234页。

代阴阳学的教授和管辖范围较唐代宽泛。

现存敦煌文献中保存一件载有“州学阴阳弟子”题记的文书，即 P. 2859《逆刺占》卷末朱笔题书“州学阴阳弟子吕弁均本是一一细勘了也”。又墨笔题书“天复肆载岁在甲子（904）浹钟润三月十二日吕弁均书写也”<sup>①</sup>。据此，李正宇认为归义军时期沙州敦煌有“州阴阳学的存在”，“技术院出现后，再不见州阴阳学的影子，可能意味着州阴阳学在天复四年以后不久合并到了技术院”<sup>②</sup>。高明士认为“州学到张承奉成立金山国前后，除原有经学、医学之外，似又添增阴阳学”，且认为“阴阳学”与“技术院”是金山国时期的新制<sup>③</sup>。而姜伯勤则认为“沙州州学在十世纪初设有阴阳科”<sup>④</sup>。从上述可知，李、高二氏均认敦煌的地方官学中设有“阴阳学”，且“阴阳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官学体系与“经学”、“医学”并存，而姜伯勤则认是州学中设有阴阳科。然据此孤证便推定归义军时期沙州敦煌设有“州阴阳学”或沙州州学设有“阴阳科”，似乎过于武断。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阴阳卜筮方面的文书，从部分文书的题记可略知当时阴阳卜筮知识的传习。如 P. 2661+ P. 3735V《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卷首题“岁月日州学上足子弟尹安仁书”。该文书正面为郭璞《尔雅注》，卷末有五条题记，纪年分别为大历九年（774）二月廿七日、天宝八载（749）八月廿九日、乾元二年（759）十月十四日<sup>⑤</sup>。前引 BD. 14636（北新 836V）《逆刺占》题记载翟奉达是“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P. 3322《推占书》卷末题“庚辰年（860）正月十七日学生张大庆书记之也”<sup>⑥</sup>。这三件文书中尹安仁、翟奉达、张大庆的身份分别为“州学上足子弟”“学生”，是知敦煌州学弟子在学习儒学知识的同时，兼习阴阳卜筮之学。

又 S. 2263《葬录卷上并序》卷首题“归义军节度使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仕（士）、将仕（士）郎张忠贤集”，卷末题“时大唐乾宁三年（896）五月日下记”<sup>⑦</sup>。P. 4996+P. 3476《唐景福二年（893）癸丑岁具注历日》卷末题：“吕定德写，忠贤校了”<sup>⑧</sup>。P. 3403《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并序》卷首题“押衙知节度参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安彦存纂”<sup>⑨</sup>。P. 2873《参谋安彦存等呈归妹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②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第43-44页。

③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第250页。

④ 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第100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第130页。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4卷，第55页。

⑧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0页。

⑨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第96页。

等坎卦辞》卷末题署：“□□月日参谋安彦存等呈上”<sup>①</sup>。S. 1473《太平兴国七年（982）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卷首题“押衙知节度参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翟文进撰”<sup>②</sup>。从上述题记以及前引有关翟奉达的第4-8则题记可知，翟奉达、张忠贤、安彦存、翟文进都曾任归义军参谋之职，且翟奉达、张忠贤还兼任州学博士，精通天文历法、阴阳卜筮。据李涪《刊误》“参谋”条载“秦汉之职，在宾幕中筹划戎机，非多学深识者，莫居是选。自乱离已后，每居藩翰，必以阴阳技术者处之，仍居将校之末，宜重而轻，诚可惜也。设有文人仗节统戎，举辟名士宜于管记，支使之间，以正其名，不亦善乎！”<sup>③</sup>是知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节度参谋”多以“阴阳技术者”担任，精通天文历法、阴阳卜筮<sup>④</sup>。

此外，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阴阳人、卜师的记载，如S. 2620V《阴阳人神智请官处分》，该文书正面《唐年神方位图》（此据施萍婷目录，王重民目录作《大唐麟德历》）卷末题有“右从下元天宝九载至庚寅，覆前勘算至乙未。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自后计算于今，却入上元甲子句中已来，一十八年至辛巳年”<sup>⑤</sup>。邓文宽考定该文书写于建中四年（783）<sup>⑥</sup>。P. 2675V《阴阳书》卷末题“咸通二年（861）岁次辛巳十二月廿五，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 汜景询二人写记”<sup>⑦</sup>。这两件文书中神智、汜景询的身份为“阴阳人”。敦煌文书中关于卜师的记载主要有P. 4640《归义军己未至辛酉年（899-901）布纸破用历》载“五月二日，都押衙罗通达传处分，支与卜师悉兵略等二人各细布壹匹”。己未年（899）五月廿八日“支与退浑卜师纸五张”<sup>⑧</sup>。该文书中的卜师应该是从事阴阳占卜的人。又P. 2615首题“□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一卷，□□子弟董文员写记通览”<sup>⑨</sup>。前引Ch. xxxviii. 005（BM. SP03）《双身观音图》题记载董文员是“伎术子弟”，故疑此题记“子”字前脱“伎术”二字，是知敦煌州学也教授阴阳卜筮之学。

综上所述，早在建中、咸通年间，敦煌文书中已有关于从事“阴阳学”之“阴阳人”的记载。而敦煌州学弟子往往兼习天文历法、阴阳卜筮，且在学成之后，多出任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第226页。王晶波拟作《安彦存易占》，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3卷，第67页。
- ③ 李涪撰、张秉成校点《刊误》卷下《参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 ④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第67页。又《唐五代参谋考略》，第89-98、166页。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4卷，第133页。
- ⑥ 邓文宽《敦煌文献斯二六二〇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文物》1988年第2期，第63-68页。
-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第196页。
- ⑧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9、261页。
- ⑨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270页。黄正建、陈于柱定名为《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参见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72-74页；陈于柱《敦煌写本宅图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9、237页。

节度参谋，甚至兼任州学博士，故可推知“州阴阳学子弟”系指地方官学中学习天文历法、阴阳卜筮等技术类知识和技能的学生，而不是特指独立的地方“阴阳学科”。这也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要求地方州县学生“既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的敕令完全相符<sup>①</sup>。又从题记中载技术院学士、学郎、弟子、子弟、礼生等称谓来看，技术院极有可能是集管理与教育为一体的职能部门，实行“宦学事师”、“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职掌天文历法、阴阳卜筮、吉凶礼仪。在唐代中央官学体系中，太史、太卜等分别职掌教授天文历法、阴阳卜筮等技术类知识和技能。而唐代地方州县官学体系中，除了经学、医学教育外，同时还负责技术类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培养技术类专业人才。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在设立技术院后，州县官学中技术类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职能，有可能逐渐归属于技术院。

---

<sup>①</sup> [宋]王溥《唐会要》卷35《学校》，第634-635页